

研究論文
Research Article

文化研究 第二十九期 2019年秋季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Autumn 2019 No.29:101-122
DOI : 10.6752/JCS.201912_(29).0006

Beyond Postcolonial Imagination and Subaltern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Allen CHUN

後殖民主義之「後」：
超越後殖民想像及底層研究作為批判
「理論」

陳奕麟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
電子信箱：achun@gate.sinica.edu.tw

投稿日期：2018年08月05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07月13日。

airiti

摘要

本文試圖對兩種後殖民主義的文化批判傳統加以澄清並反思。一方面，所謂後殖民理論文獻引起了激烈爭議，但筆者認為許多問題是定義矛盾所造成的，並在不同的學科裡產生了不相容的思考模式。另一方面，「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植根於不同的具體歷史脈絡和理論範疇，同時產生了不同類型的問題意識。透過反思兩種不同但相關的後殖民主義及其跨學科影響，本文主張釐清知識和其事實脈絡之間所產生的共棲關係，才有助於解構殖民文化權力的運作。但兩者最終批評的對象仍然是以西歐為中心的理論正統權威或歷史主流經驗，因此原則上能建立在共同研究架構上。

關鍵詞：後殖民主義、底層研究、西歐中心主義、治理性、文化批判、社會理論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and critique of two genres of postcolonial cultural critique. On the one hand, so-called postcolonial theory has sparked heated debate in the literature. I argue that many problems are caused by contradictions in definition; in different disciplinary contexts, they have created incompatible conceptual mindsets. On the other hand, subaltern studies is rooted in a different concret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us at the same time creating a different kind of problematic. Through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of these different but related postcolonialisms and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influence, this paper will emphasize the collu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its field of practice in order to deconstruct the operation of colonial cultural power. Yet the object of critical gazing for both is still Eurocentric theoretical authority or its historical prevalence, thus in principle can ultimately be viewed within the same frame of analysis.

Keywords: Postcolonialism, Subaltern studies, Eurocentrism, Governmentality, Cultural critique, Social theory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思想對後殖民主義的批判傳統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一)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在1979年出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基本上是從傅柯的論述概念演變出來，繼而誕生了如文化論述、帝國霸權等若干後殖民想像。麥克林塔克(Anne McClintock 1992)、休哈(Ella Shohat 1992)和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 1994)則指出，後殖民理論與其字面意義不同的是，它並未塑造殖民後的任何「主義」，反而促進了一種新的西歐(批判)理論。(二)另一方面，「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在底層研究論述中演變出來，繼而成爲殖民統治的政治批判武器。殖民治理超越了印度史的脈絡，並延伸到其他歷史時間性和社會狀況。換言之，上述兩種後殖民論述的影響不同，但其批判的應用價值能超越其字面的詮釋範圍和具體事實脈絡，並發展成爲更廣泛的思考架構。以此爲出發點，對兩種後殖民主義進行辨析更能展開理論的解殖運動。

一、後殖民主義理論作爲具體實踐

所謂後殖民主義理論的詮釋目標，事實上不一定是殖民現象或其歷史經驗本身，因此與其字面定義頗爲衝突。後殖民主義的若干爭論在1990年代顯現而逐漸成爲系統性的批判思想。然而，對於不同學科而言，後殖民主義的意義和影響也不同。不同的思考模式和具體焦點產生了互不相容的分析論述，因而造成許多方面的混亂。嚴格來說，定義問題才是掌握後殖民思想的理論潛力和批判效率的關鍵出發點。定義固然重要，但其理性並不歸因於其想像的可能性，而是其對社會真實的抽象規劃和推理效應。「後殖民」一詞何時開始，其實反映後殖民主義理論如何誕生。¹麥克林塔克(1992)、休哈(1992)和德里克(1994)在批評後殖民主義理論時，強調其

1 在殖民主義(現象)之後，殖民主義研究有歷史悠久的傳統。該傳統從未自稱「後殖民主義」。關於最近的理論潮流，許多學者不一定認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學派，因此對該名詞引起許多爭論。

所指的現象並非被殖民社會後來所造成的政治事實或學術論述，而是西歐主流學者為它所歸納出的理論理解。後者不僅脫離殖民主義專家所探討的具體歷史脈絡，更反映了其內在的西歐中心主義。簡言之，「後殖民」的理論危機——即上述對殖民影響的不同詮釋——並非殖民主義研究本身所導致的，反而是西方文學研究圈本身所塑造出來的理論想像。麥克林塔克(1992)批評了後殖民一詞來強調殖民主義現象其實比我們所承認的更為普遍，進而提出後殖民批判的廣泛價值。德里克(1994)區分「西歐式」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和殖民主義後的在地批判傳統，來優先重視在當地具體脈絡中誕生而形成的批判理論。這個在殖民結束後，於當地實際脈絡中所生成的批判論述，我們應該稱之為後殖民主義¹，其批判傳統能歸根於左派的政治經濟理論與思想、底層研究學者的理論反思等等。這個當地實質傳統後來引發的新的思考模式，我們應該稱之為後殖民主義²（理論）。後殖民主義²理論採用了不同的色彩，更明顯注重文化及文學想像。不同的學科論述，雖然語言互不相容，但也因此增強了其認識論中所採用的方法論工具。

陳奕麟(Chun 2008: 707)曾經批評過後殖民主義²理論在背後所強調（或暗示）的主體認同，其實成爲了德里克所諷刺的表面批評，因爲這種源於西歐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忽視了自身乃是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現象。但更重要的是，它遮蔽了後殖民主義²在認識論上的特殊價值和方法論上的使用潛力。儘管從文獻中發展出若干聲音，但我們還是未能清楚指出後殖民主義²真正創新之處何在。換言之，新的「批判性法農主義」(critical Fanonism, Gates 1991)總有可能，又或把底層研究轉化爲普遍的批判理論，但我認爲，任何後殖民主義批判理論，最基本的條件標準應該是能對殖民現象和議題更有效地加以釐清，否則何必稱之爲後殖民主義？²在左派政治和歷史學界，殖民主義的批判論述豐富。尤其在殖民地，反殖民運動和論述夠多，後來，以反帝國爲主的批判思想，例如第三世界的「依賴理論」

2 近年來，在人類學，我們不能忽視Johannes Fabian、Nicholas Thomas、Ann Stoler、Jean & John Comaroff等學者關於歷史和文化結合的研究貢獻。在歷史學界，Frederick Cooper的研究著作特別值得注目。

(dependency theory)，尤其在1960年代頗為流行，緊接著是現代世界體系理論(modern world system)和各種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理論。

後殖民主義²的一種定義方法，就是將之視為「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最先進模樣，其對殖民主體性的澄清表達最為明顯。透過種族差異的主體性架構，後殖民主義²試圖對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於1952年所著的《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書的文化二分加以概念化並發展為批判理論。讀者能容易從後結構主義的角度來閱讀巴巴(Homi Bhabha)，並在法農所描寫的殖民狀況裡反映出一分裂的自我主體，又或是然詹莫哈穆德(A.R. JanMohamed)之所以於法農歸納出「殖民者拜火教式」(Manichean)寓言，又或者理解史畢娃克(Gayatri Spivak)傾向把所有論述視為殖民主義。無論從哪種角度來解讀，想像的差異都歸根於絕對的權力狀況，其象徵邏輯所**假設**的殖民政治最終成為普遍理論的基礎。³在此論述形成的過程中，後殖民主義²更重要的是增強了文化所扮演的分析角色而能擴展批判的跨學科範疇。

換言之，差異中的文化或文化中的差異，也就變成了後殖民主義²的新論說。在某程度上，對於多數從事殖民研究的學者而言，這正是後殖民主義²的主要貢獻，其他要素皆同。這同時給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賦予了新的批判意義。儘管其在廣闊的相關論述中構成了最明顯的影響，我卻不認為它是最精彩或最具突破性的後殖民主義²典範。從許多角度而言，薩依德所著的《東方主義》的影響力不可低估。差異政治和文化的角色，與他所構思的東方主義及其所連累殖民關係頗為相關。但論述和權力之間所產生的共謀或共棲(collusive)關係，致使統治暴力的面貌模糊不清，甚至把其支配效率提高昇華(sublimate)，變得更為抽象，因此給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辯證二分賦予不同層次的意義；一般後殖民主義所**假設**的文化差異其實是由該共棲關係塑造的。

3 關於法農這個議題的詳盡資料和相關論述，可參考Gates (1991)。

東方主義的運作有兩面：在人際互動的層次上透過「凝視」(gaze)被殖民「他者」(other)的過程中實際產生差異，以利統治主體將其權威性正當化。在客觀書寫的層次上，繼而透過論述的中立性驅除而抵消上述文化差異，以利統治過程順其自然而合理。東方主義者以觀察、法治和書寫的方法工具來描述和分類事實。更重要的，他再現被殖民者的正當性不僅來自於其學問論述的中立說服力（客觀權威），而且同時依靠被殖民他者接受而服從與之相關的一整套知識系統，而與殖民者構成了某種共棲關係。這個權力架構和現代社會的紀律生活所塑造的道德典範和規則性一模一樣。簡言之，後殖民主義²可視為以文化差異為基礎的批判理論。但我要強調後殖民主義²能發展為更精彩的批判理論；它所主張的文化差異應該以中立論述（已被抵消的統治暴力）為出發點來予以質問、探討殖民體系的治理性過程。

二、學科間的知識分界：後殖民能否在社會理論中發言？

在社會學的領域裡，後殖民主義的影響力可說是微不足道的。我應國際社會學協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之邀，曾加入其社會理論研究小組(Social Theory Research Committee Board)。我在研討會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後殖民能否在社會理論中發言？〉(“Can the Postcolonial Speak in Sociological Theory?”)的文章。該文的篇名明顯模仿了史畢娃克(1988)所著的〈底層能否發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我故意提問一個關於後殖民主義對社會理論的相關性問題。其中發言權的角色，對文學家而言，理所當然特別關鍵，原因在於它重視作者背後的主體性或權威性，即author-ity。一般而言，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裡，作者的書寫角色在科學分析和理論建構中並不重要。若被引發討論的話，主體性所指的平常是社會行動者(agent-actor)罷了。當史畢娃克聲稱「底層」(subaltern)階級無法發言之時，她所指的並非語言的障礙或是溝通的不可能，而是論述的再

現受制於發言權多於其理性內容本身。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後殖民的發言權其實是一種「權力被剝奪」(disenfranchisement)的政治批判或「反霸權」(counter-hegemonic)的思想。

任何後殖民主義應該涉及殖民現象及其具體社會存在，表面上是理所當然的常識。不過，上述理論事實上與實際所指的具體現象彼此之間並無直接的關聯，甚至有許多不相容之處。換言之，定義有問題。在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殖民主義及其後果直接導致了民族主義運動和現代國家的誕生。字面上，「後殖民」理應是指政治獨立。在正統的世界史教科書裡，從傳統社會到現代國家是普遍敘事；上述後殖民主義也應該多少牽涉到現代國家理論。在第三世界的脈絡中，我們即發現有些具體事實受到特別注視，對理論的形成影響亦有優位差異。譬如說，非洲和印度頗具代表性，南美洲相對說來對理論模式的影響更邊緣。更離譜的是，有些字面上能歸類為殖民地或殖民主義的地方被正統（主流學界）學者忽視。在19世紀來自西方的移民大量開拓了新地盤，並在移居的過程中屠殺而剝奪了土著民族的領土。澳洲學者最近把該現象稱為「移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但美國歷史學家從未把這段歷史歸類為殖民主義。根據表面定義，後殖民主義應該牽涉到殖民過程後的平定化時期，這怎麼不是後殖民主義呢？尤其在殖民主義理論文獻裡，似乎都能看到19和20世紀，英國、法國、荷蘭等殖民統治經驗被重視和考慮，更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於南美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主義經驗卻不被視為主流現象。所謂後殖民主義²一詞在1990年代的（西方）正統學界才開始受歡迎（即在殖民主義的歷史統治衰落後），但同時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本土學派，卻引起熱烈爭論。其理論影響在文學界及相關的文化研究最顯著，其次在歷史學和人類學等學科。其理論影響與現代性、全球化等理論又有重疊。

後殖民主義¹和後殖民主義²彼此間的不相容性可說明如下：前者與其歷史根源脫離不了關係；後者試圖透過歷史事實來歸納出理論體系，但觀念的定義往往反映其具體色彩或應用脈絡。其系統理性同時無意中也受到

學科性的支配。無論如何，我認為社會學應該能發展出一個後殖民主義的模式或方法。從字面意義而言，這應該涉及殖民社會的歷史研究，但在社會學裡這一直是主流不注重的邊緣領域（相對於現代社會）。⁴儘管社會學逐漸國際化，但其理論典範仍然偏重西歐社會與文化。因此，我特別想問的其實是：後殖民主義²為何不能在社會學理論中發言？

原則上，我認為後殖民主義的廣泛批判值得社會科學界的關注。簡單來說，後殖民主義²的主要貢獻可描述如下：作為思想模式，後殖民主義²具有兩個特徵：（一）相對於早期的反殖民批判，它強調殖民統治的文化性質或角色；（二）作為後殖民批判方法，其文化色彩能歸根於「認同」。換言之，文化統治過程呈現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主觀想像和行動中。兩者之間的互動把反殖民批判思想正當化，並且供給被殖民者發言權。後殖民主義²也延續了殖民時代的政治批評、中東學者對西方的東方主義的批評、早期依賴理論、底層研究等思想傳統。但更重要的是，在人文科學和文學理論的主流思潮中，其被形塑為「西歐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認識論批判模式。在方法論方面，後殖民主義理論後來在區域研究、女性主義理論、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發揮了，並塑造了一種新的語言來配合早期的政治經濟批評。儘管文學批評為其出發點，但批判的範疇擴展到若干制度（經濟、政治及知識之間的依賴互動使學者能詮釋其文化運作）。我在此特別強調詮釋，乃是因為它基本上依靠**價值判斷**，而不僅是觀察的後果。換言之，政治統治和經濟剝削的詮釋或價值判斷比其事實性來得重要。請問，這最終有何關鍵影響？

其西方文學和主流人文學科的學術來源能使一般人質疑後殖民主義²與實際殖民主義或其歷史研究傳統的相關性。儘管後殖民主義²是非西歐學者所提倡的批判性論述，繼而主張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和本土發言權，但它同時引起奇特的反彈意見。德里克(1994)在〈後殖民光暈〉(“The

4 請參考Go (2013)和Steinmetz ed. (2013)在社會學中的代表性著作。

Postcolonial Aura”)一文中曾諷刺地指出，後殖民主義²論述受到一般學界的認可，實際上乃源於非西歐知識分子的權威性被主流學院接受甚至稱讚，但這同時透露任何後殖民主義²（以本土認同為主）的理論局限性。但我關注的，其實是詮釋的侷限性，多於後殖民認同的侷限性問題。在理論的考量中，我們應該對殖民主義的歷史事實加以文化詮釋並反思批判，但在詮釋過程中許多不屬於嚴格定義的統治政權也被稱為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大致上我認為上述詮釋定義或主觀價值判斷的優點比缺點多。文化詮釋和殖民主義批判性分析背後的價值判斷，使得研究觀察者把「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客觀」知識、現代性的若干面貌、啓蒙時代的理性、規律統治、民主政治、基督教的文明任務等現象，都視為後殖民主義所要批判正當性的凝視對象。事實上，分析客體不侷限於上述例子。如果「人類」(humanitas)及其普遍理性只不過是西歐中心主義所塑造的主觀思想，那麼其他理論知識甚或社會科學同樣頗具西歐文化色彩才對。主流社會學理論也應該不例外。

總而言之，我在這裡想提的問題是：在社會學理論中，後殖民該如何能獲得發言權？事實上，社會學理論到底是否需要去殖民化？根據上述後殖民主義²的詮釋定義，後殖民批判理所當然應該與殖民地社會最具相關性或應用價值，但嚴格來說不限於此。後殖民主義的社會學在非洲、南亞洲、南美洲及其他殖民地應該是最發達的。文化角色和主體想像等因素也應該被加進考慮，或用以改善早期的殖民社會研究。但我的最終目標卻不在於發揮這種後殖民主義¹的分析方式。若把後殖民主義²的認識論批判推至最極端去思考的話，它其實暗示所有社會理論應該都能被類似的文化反思加以批判才對。尤其是，如果將之應用到非西方的研究、傳統的社會時，我們到底能夠如何確保這些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工具確實是價值中立的？所有現代社會理論在19世紀經典時代都植根於具體社會現象或政治經濟制度（及其抽象運作）的批判性分析，譬如資本主義和現代性。上述突破分析後來成為了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的重要基礎，但我們能否反過來說，

上述理論同時受限於其具體起源的文化根源？

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澄清後殖民主義²在學術界裡如何誕生於西方文學（外文）系這一學科，然後再由主流（西方）學院流傳到後殖民地的學界。儘管它供給沉默的他者發言權或書寫權威性，但後殖民論述主要批判的是殖民時代的西方語言文學（例如英聯邦文學 [Commonwealth literature]）和學問，以便反思其背後的西歐中心主義的宇宙觀以及文明觀。事實上，它對於後殖民地的本土（尤其非英語）文學和人文學問（例如中國文學本身）的影響不大。本土論述和離散知識分子如薩依德、史畢娃克和巴巴等人所提倡的後殖民主義之間的差別，已被德里克、休哈和麥克林塔克指出，亦即，在某種程度上，離散的後殖民主義²對後殖民地的影響，在西方（外文）文學裡遠大於在殖民主義研究的圈子裡。由此看來，其內容雖然表面上賦予給土著學者和本土學問發言權，但它實際上仍然成爲一般西方理論的散播點。在東亞地區，最熱心接納後殖民主義²者包括文學、女性主義研究、歷史學以及文化研究等學科。相反地，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卻傾向不歡迎後殖民主義²的學術影響。請問，就後殖民主義²而言，爲何它對某些學科的影響明顯，而對其他學科卻不然？我認爲其方法論並無差別，但背後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心態，差別甚大。

簡而言之，儘管後殖民主義²源於文學批評的學科爭論，但其焦點乃是文化再現，因而對作者主體性的關注成爲其方法論的特徵，進而對看似中立論述甚或客觀知識中所隱含的歐洲中心主義提出突破性的反思；但是它的批判對象事實上卻不限於殖民地社會。在殖民統治的脈絡中，上述因素確實成爲互相共棲的文化霸權，但原則上其他政治官僚系統和社會支配宰制也依賴類似的文化再現、作者的主體性、認同形成和知識作用。傅柯已經證明上述現象是現代社會所塑造的。現代國家(state)的體系操作也更應該如此。換言之，後殖民主義²應該能應用於任何理論或機構作爲批判模式。社會學理論也有作者；作者背後應該有主體性，它如何塑造其正當性或權

威性？其文化定義和概念理所當然是中立的嗎？如果社會學源於西歐現代性經驗的基礎上而發展，則其客觀性來自何處？據我所知，社會科學從未反省過其內在在西歐主義的存在，反而強調其現代客觀性；否則，如何解構其文化定義或社會性質？有沒有必要反思其認識論的基本假設？後殖民主義²的批判能應用於社會學的哪個範疇？文化詮釋的想像可能(interpretive imagination)實際上有侷限性嗎？

如果我們慎重考慮恰克拉巴帝(Dipesh Chakrabarty 2000)於《將西歐在地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的論點，其中一個把西歐歷史經驗的普遍價值去神秘化的方法，正好就是將之視為另一個「在地」(local)。在某種程度上，反思現代性或普遍理性的文化批判所扮演的正是這個角色。理論在人文及社會科學中的「神聖」性質也是類似的範例：它必須把社會視為客觀結構，才能採用中立概念作為抽象的系統分析。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其客觀性質能避免的涉及政治或行動者的權力運作？上述現象都是後殖民主義²凝視的正當性對象，霸權如何操作是文化詮釋的目標。

三、底層研究作為抽象思想

在這個小節裡，我暫時把後殖民主義²（理論）放在一邊，並從另一邊重新檢視此問題。植根於具體政治的後殖民¹（批判）能否超越其地方脈絡並發展為一般批判或廣泛理論？我選擇把焦點放在「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並不只是因為它能應用到其他殖民處境，又或於某些學科上影響後殖民思想的構成，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其思考方法的獨特性遠遠超越其地方性批判的具體性質。法農的政治論述後來變成各種理論的發展模板。與「批判性法農主義」不同的是，底層研究，以創立者古哈(Ranjit Guha)以及其夥伴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和史畢娃克為例，儘管其所凝視的具體對象一直是印度歷史和社會，但其所參與的辯論一直嵌入在理論議題當中。史畢娃克的學術背景眾所周知，而查特吉的納薩爾(Naxalite)或

毛派背景亦與此相關。毫無疑問，古哈的洞察力是把底層研究變成思想派別的引導性力量。姑且不論其在印度研究討論的鑲嵌性，它們其實持續與馬克思主義直接對話。也是基於這個原因，如果單純把底層研究視為地方區域研究典範的話，實在是過於簡化。事實上，其對理論的批判性關注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密切關係，才代表底層研究作為知識運動的特徵。更確切地說，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動成為其典範基礎；在泛文化的比較分析架構中，其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潛在可能性才得以彰顯。

古哈(1983)的專書《殖民時期印度農民起義的基本特徵》(*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不僅試圖回應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和湯普森(E.P. Thompson, 1924-1993)所主張有關從下而上的史學研究主流，而且更重要的是強調了印度歷史的「特殊主義」(exceptionalism)，尤其是關於所謂「被政治化前的民衆」(pre-political people)在社會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將此回應直接解讀為對馬克思主義傳統及其西歐中心主義的文化根源和內在假設。恰克拉巴帝(2000)的專書《歐洲去中心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則是對此論點的詳盡延伸，並以抵抗的農民起義作為其出發點，來批評歐洲在世界史中的主流位置甚或西方理論的普遍性質。但古哈要強調的主要是印度的特殊主義，換言之，任何地方歷史的特殊主義。農民在印度的獨特位置其實是其社會構造的結果，更重要的它體現了其背後的運作霸權，亦即古哈所謂的「無霸權的統治」(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古哈，首先在印度學界中培養底層研究的學派形成，然後在英國薩西克斯(Sussex)大學和澳洲國立大學擴展其核心模式，並扮演重要角色。

奇柏(Vivek Chibber 2013)所著《後殖民理論與資本的幽靈》(*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一書批評了底層研究的印度特殊主義，並試圖為馬克思主義辯護。不過，印度特殊經驗中最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英國殖民統治，這使得底層研究得以成為潛在的後殖民主義理論。查特吉(1993)對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於1993年所著的《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提出類似特殊主義的批評，而這正是他《國家及其碎片：殖民與後殖民史》(*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的基本論點。最關鍵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如何概念化？其歷史社會現象如何成為實踐過程？其背後的運作如何受到文化心態所導引，成為認識論及方法論中的主體和客體？查特吉常以所謂「殖民差異原則」(the rule of colonial difference)批評或修正西方政治理論。他強調的是，第三世界所出現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殖民情況所造成的現象；這不僅代表歷史特殊主義，而且能說明現代民族國家，尤其是安德森(1993)所強調有關「民族國家」(nation)的「模組性質」(modular nature)。上述辯論都有意義，底層研究同時遭遇其他印度史學家甚至劍橋大學以及其他西方印度學界的具體批評，並引起了廣泛爭論。理論文獻常指出後殖民主義²如何受到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的影響。底層研究的理論化也可以從類似角度去解釋，但這比較容易誤解。殖民和後殖民都植根於歷史實踐，其應用概念最後必須根據其實質的社會性來定義，加以詮釋甚或理論化。

後殖民主義¹和後殖民主義²基本上區分兩種學者和兩種研究心態：其一把殖民主義定義為具體歷史甚或政治現象，其二試圖透過上述具體經驗歸納出某種深層的殖民性(coloniality)。雖然二者代表學科間的區別或二分，但其互動關係事實上頗具建設性。後殖民主義²在骨子裡被批評為西歐中心論，但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和傅柯從不同角度強調所有認識論植根於其歷史來源與地方實踐。所有現代社會理論，從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到涂爾幹(Emile Durkheim, 1858-1917)和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及其經典著作，都透過對當時當地社會現象（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的批判，而逐漸發展為深層分析和抽象理論，最終被社會科學客觀化而已。我們同樣必須承認殖民主義的特殊與具體地方性質，但如何超越其社會實踐性而其廣泛的殖民性，其實是大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底層研究的學術影響早已超越了印度和印度學的地方範圍。珍妮亞夫斯基(Eva Cherniavshky)曾於1996年在*boundary 2*發表一篇

名為〈在美國框架中的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 in a U.S. Frame”)的文章，把早期美國歷史歸類為殖民主義。其建立在種族滅絕(原住民的屠殺)的基礎上，並維持其以種族為主的勞工資本體系作為統治宰制。她嚴格採用古哈關於「無霸權的統治」的概念來解釋美國的殖民統治模式。把美國的殖民主義如此定位之後，她繼而探究其對後美國(post-American)敘事的後果。她跟隨薩依德所謂東方主義的說法，指出後續的學術論述詭秘地把上述殖民主義的實質暴力從美國文化和社會的歷史紀錄上剔除。在泛文化比較的脈絡下，我們可以問，正如古哈所提，「在殖民主義下，中產階級的文化是否已到達其歷史上的極限」？珍妮亞夫斯基最後提問，底層作為主體性(尤其是種族或性別身分)能否導致其他的抽象後果？無論如何提問，二者明顯透露「後殖民主義」的理論轉向。

底層研究的第二個應用例子則是拉丁美洲研究學者。據我所閱讀的英語文獻，其主要的代表包括畢維利(John Beverley)、馬隆(Florencia Mallon)、莫勒雷斯(Alberto Moreiras)和米諾羅(Walter D. Mignolo)。在《拉丁美洲底層研究讀本》(*The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中，主編羅德里蓋茲(Ileana Rodríguez 2001)指出「拉丁美洲底層研究小組」(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Group)於1990年代在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成立。這也就是桑地諾解放陣線戰敗於尼加拉瓜之後的一段時間，此小組隨後逐漸擴展，加入了拉丁美洲學者、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人。其創立的成員多數為1960年代的左翼分子，許多人也參與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主持的「馬克思文學團體」(Marxist Literary Group)的讀書會，譬如畢維利和史畢娃克。在這本論文集的引言中，羅德里蓋茲強調該拉丁美洲底層研究計畫涉及激進的文化批判，包括「與底層再現相關的形、解讀，並解構學科」(forming, informing, and deforming disciplines)。把底層視為異質的「前西方或非現代主體」(pre-Western subject)的同時，他們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中關於階級，以及族群研究中關於種族等概念的缺點或內在問題。由是，底層成爲一個很有用的概念，尤其作為策略，

能用以展示霸權和統治的邏輯如何運作。特別在面對政治鎮壓的情況下，大眾民主運動如何成為「從屬」(subordinated)。我必須詳細說明這些潛在的關係，因為在上述美國和拉丁美洲的例子當中，底層這個概念的採用其實是建基於社會實踐層面上而執行，不僅是盲目套用表面觀念或專有名詞的結果，最後進而提倡了一個獨特的批判模式。拉丁美洲的殖民主義比起世界其他區域歷史悠久，但其對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卻顯得微不足道，這應該是引起基本反省的重要理由。

古哈也為《拉丁美洲底層研究讀本》撰寫了一章。在這篇文章裡，他提到，雖然底層研究無可避免地關係到南亞的經驗，其與其他地方的關連卻並不建立在「地域性」(territoriality)而是在「當代」(our time)，尤其是「全球時間」(global temporalities)所形成的共同經驗。在這點上，我們可以提問，何謂後現代性？回到原初的精神，何謂啟蒙運動？然而，在南亞的狀況下，這個全球時間其實牽涉到殖民地國家體系(colonial state)所導致有關理性的歷史失敗。這個失敗的原因其實反映在拉丁美洲民眾想要民主化的追求，以及在其中所形成的從屬關係。但對古哈而言，後殖民的轉向事實上在骨子裡涉及印度國家體系的殖民主義。其所導致有關理性的歷史挫敗直接涉及殖民主義的治理性。

最後一個外在於印度脈絡的底層研究例子是東亞，尤其是臺灣。最熱心提倡底層研究作為後殖民批判的學者之一是陳光興(Chen 2010)。他對底層研究的支持，與其所主編的《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中所主張的後殖民主義，密不可分。儘管陳光興(2000)將之稱為「帝國之眼」(imperialist eye)，我認為後殖民主義²更有助於其亞際運動的政治提倡。儘管不被印度、非洲、中東等的殖民主義專家所承認，東亞卻是應用後殖民主義²的活躍地區。除了陳氏之外，白露(Tani E. Barlow 1997)對美國戰後亞洲研究的批判和羅永生(Law 2000)對香港九七後所主張的「北進殖民主義」(northbound colonialism)都符合上述所謂的後殖民主義²。白露類似於薩依德，透過歷史書寫和社會功能論等意識形態的象徵暴力，試圖歸

納出其「不自覺的壓制」(unconscious repression)的文化性質。事實上，其後殖民主義能植根於實質的殖民統治、想像的帝國主義、甚或資本主義。陳氏的帝國之眼和羅氏的北進殖民主義的批評對象，其實並非殖民統治本身，而是南進政策中和邁向中國擴展的全球資本主義；兩者是由某種「次帝國主義欲望」(sub-imperialist desire)引起的。換言之，此類型的後殖民主義不一定涉及實際的殖民主義，反而強調其深層的批判政治和文化運作。底層研究竟似乎恰好符合陳氏的政治意圖。關於此點，我認為毫不訝異。但相對而言，底層研究的本土意識或文化批判是其次的。

簡而言之，談論這些個案分析到底有什麼意義？相對於西歐為中心的後殖民主義理論，我認為底層研究更適當地符合德里克對土著後殖民批判所下的定義。儘管底層研究一直被嵌入到更廣泛的理論爭論中，我們不應該將之歸類為本土論或地方批評。然而，底層研究事實上能擴散到其他地方而發揮影響，就顯示出其影響力並未僅限於本地(nativist-qua-localist)，因為嚴格說來，其批判性質基本上是政治的。它明確的政治性更令我們反思政治實踐如何能夠成為理論。古哈的著作對美國和南美洲的殖民性定義或詮釋，就頗具代表性。

底層研究的理論性不是指其歷史意義上或區域應用上的普遍性，而是指其概念化的中立性。所謂（西歐式的）後殖民主義欠缺實踐根據；它不依賴實質殖民主義的先決存在，而建立在定義推論的理性基礎上。如果全球資本主義能被視為後殖民主義的凝視對象，那麼任何現象都能被視為凝視對象。換言之，它不一定植根於殖民事實本身；其正當性依靠其詮釋定義和推論的想像理性。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底層研究原先植根於地方歷史實踐，但其若干版本在推論過程中都遭遇不同類型的問題。底層研究的主要代表，譬如古哈、查特吉和恰克拉巴帝，所主張的後殖民主義批判在骨子裡都強調印度的歷史特殊主義，其實是什麼地方的歷史特殊主義。儘管史畢娃克積極參與底層研究的運動，然而我認為其思考模式比較接近薩依德和巴巴對西歐中心主義的批判思想，而相對地不像底層研究的歷史

反思。更進一步而言之，我認為後殖民主義¹能發展為普遍理論或中立學說，但其驅動原則不一定侷限於歷史特殊主義。此外，也應該有其他理論後果。後殖民主義¹如何加以詮釋其實是關鍵而複雜的理論挑戰。

作為附註，主張後殖民的印度學者不都屬於底層研究。南迪(Ashis Nandy)和阿莫德(Aijaz Ahmad)是最顯著的例子。此外，參與而出版在《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系列論文集的學者也不限於印度人。亞諾德(David Arnold)和哈迪曼(David Hardiman)都是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印度歷史學家，他們合編了《底層研究》的第八輯。另一位影響底層研究的西方學者是柯恩(Bernard Cohn, 1928-2003)，他是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家和印度歷史專家。對於柯恩1987年所著的《歷史學家之間的人類學家》(*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古哈指出，柯恩在印度歷史的脈絡中可能是最初把殖民主義當作問題意識，並把在地觀點作為正當的理論角色，以便挑戰西歐論述。儘管柯恩名義上不屬於底層研究學派，但其若干分析卻促進了底層研究的批判取向。柯恩所指導的早期學生印登(Ronald Inden 1990)對印度史採用了儀式象徵(ritual-symbolic)的觀點，撰寫了《想像的印度》(*Imagining India*)一書來推翻英國學者所提倡的東方主義歷史。柯恩晚期的學生德克斯(Nicholas Dirks)則把柯恩對於歷史和人類學的後殖民方法發展為系統性的理論學說，其中最顯著的著作是2001年的《思維的種性：殖民主義與現代印度的構成》(*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事實上，德克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系聘請了查特吉和曼姆達尼(Mahmood Mamdani)，然後聘請卡薇賴(Sudipta Kaviraj)到政治系。德克斯明顯試圖把底層研究擴展為一般批判理論。

四、後殖民主義從歷史的特殊批判到理論性的特殊主義

請問，後殖民主義²中的批判性法農主義和從建基於反殖民實踐中所發

揮的後殖民論述究竟有何不同？首先，與德里克所諷刺批評的後殖民主義²不同的是，底層研究對馬克思主義演化論的歷史批評證明，後殖民思想比薩依德、巴巴和史畢娃克等「離散」學者所主張的後殖民主義²先出現。第三世界的批判意識被承認，但第一世界的主流學界卻一直將之視為一種本土論，並非另類的理論。在地批評和理論傳統不僅不斷有互相影響，而且上述「後」殖民論述主義彼此間的不相容性其實是不同的學科思考模式造成的，並非直接涉及理論內容本身。更有甚者，學科性能影響理論的普遍相關性嗎？

一般人都假設理論能自然地超越學科界限，其跨學科性更能確保理論的中立性或共通性；我們對後殖民主義似乎有同樣的期待。然而，後殖民主義的爭論卻揭示了，不同學者或觀察主體所定義的詮釋範疇有所不同，因此即將影響到其分析模式和推論後果。在對照後殖民主義¹和後殖民主義²時，我認為兩者最不相容性、而且難以協調之處是，觀察者或作者背後的主體性截然不同。後殖民主義¹總認為理論受到殖民事實的影響。然而，後殖民主義²總依賴其詮釋分析的理性價值。但定義的有效性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某些界限也是塑造的。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暗示殖民主義的霸權運作其實超越其政治經濟宰制，而麥克琳塔克等人則指出殖民主義一詞的實際應用對象亦有問題。上述定義在不同學科脈絡中造成不同的後果。在文學的領域裡，薩依德的後殖民主義理論開拓了一個新的思想和分析領域。但在文學架構外，上述思考模式和分析方法極有限。麥克琳塔克所採取的定義亦把殖民主義視為一個普遍現象，但對具體史學家和各種區域專家而言，這應該使理論範疇更加分化。更不用說，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形式的殖民主義有所不同，其政治、經濟、文化宰制和實際經驗同時受到殖民地若干地方因素的影響而變。換言之，理論的相關性也有其極限，再加上學科間的不相容性，使得問題更為複雜，相互理解更為困難。無論如何，我仍然對殖民主義現象抱持社會科學的態度；無論好壞，這將影響我的文化定義及其使用範圍。另一方面，我對文學家的想像力抱持保留態

度，至少自由發揮有限。這些分析方法和詮釋模式都牽涉到價值判斷，並非對錯問題。總而言之，後殖民主義²在方法上能應用於後殖民主義¹的分析中，但其有效性仍然建立在（對社會事實的）價值判斷上。

我現在可以解釋，為何我認為後殖民主義能發展為普遍理論，而不一定要建立在歷史特殊主義的基礎上。我雖然同意歷史學家：現象、制度、文化及其分析都必須踏實，但我不一定同意具體社會、歷史、文化分析的意義和使用價值只不過局限於其地方脈絡。這才是歷史特殊主義的原則和道理，甚至驅動任何區域研究的基本理性。由古哈到恰克拉巴帝，底層研究透過馬克思主義社會演化論的修正，甚或西歐現代性普遍歷史的反思批判來強調所有社會和歷史的特殊性質，頗具貢獻，值得提倡。這至少比盲目提倡本土主義以糾正西歐中心主義為佳。本土主義也包括民族主義；相對於帝國，這應該代表標準的後殖民主義¹。它所導致的各種國學，其所代表的精神，恰恰與後殖民主義理論精神不相符合。但後殖民主義¹同時卻能發展為後殖民主義²的理論反思。需要解除殖民的不僅是在地的剝削狀況，而是外在霸權及其正當性的內在根源。這個霸權能展現在任何政治機構或社會制度，但其制度化的運作同時依賴客觀理性來發揮正當性的效率。

更重要的，我之所以問，「後殖民能否在社會學理論中發言？」也是受到柯恩和德克斯的啟發。我懷疑，很多所謂價值中立的概念歸根於西歐經驗，因此頗具主觀色彩。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等經典理論當初都以當代社會現象切入，針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加以探討並反思。換言之，社會理論仍然建立在西歐地方分析的基礎上而擴展到全世界。在概括化的過程中，上述經典理論如何把其西歐來源或文化色彩驅除掉？如果理論是普遍理性，那麼，它同樣需要「解殖」。柯恩和德克斯的後殖民批判另外強調，印度的「傳統」社會結構也是被殖民主義「發明」而凍結的。在（殖民統治）社會支配的過程中，種性階級和宗教身分被客體化和結構化，因此成為政治建構。其運作方式其實與歷史過去不同。總而言之，歷史特殊主義只是分析的切入點；現代理論的「解殖」應該是後殖民主義批判的

最終目標。社會理論能「解殖」嗎？這個問題其實是價值判斷，而且認識論架構必須重新定位。現代化是指科學技術發展，但客觀科技要解殖嗎？現代性來自西方，但務必歸根於文化嗎？學院早已被西方化，知識基本上被其文化汙染了嗎？民族國家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其內在暴力如何開始抗拒？法律統治要解殖的話，其背後的正義觀念和民主政治的倫理道德是否必須反思？主體想像和文化差異不一定決定一切；價值判斷其實也是主觀定義，但必須有客觀標準，並涉及另一套遊戲規則。

最後，我們可以接著問，殖民主義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有何相關性？在殖民主義的學術論述中，上述觀念也有一段歷史：史考特(David Scott 1995: 191) 引用了傅柯和阿薩德(Talal Asad)的著作來強調，現代國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成為現代性的重要主軸，且與殖民/帝國甚至後殖民的統治過程（及其衰亡）一脈相承。史考特試圖延伸查特吉有關殖民治理性(colonial governmentality)的說法，並強調其文化差異的內在政治，事實上代表現代權力演化的其中一個階段。查特吉所提有關殖民政治中的內外層面，被史考特詮釋為治理性性質的轉變：現代權力的「應用點」從經濟轉換到社會。我反而強調，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殖民主義集中在其論述內容和實踐運作。⁵需要解釋的是，尤其在19世紀末期，「傳統」突然間被視為凝視和治理的對象，繼而被法律歸類和社會支配。這個過程其實與柯恩和德克斯的論點重疊。該「治理性心態」(governmentality)其實已經失去理性（可參考Fabian 2000）。簡而言之，後殖民主義批判植根於社會事實，但必須透過對知識和其事實脈絡之間所產生的共棲關係的反思來解構其文化權力的運作。如果連文化傳統都被殖民統治甚或現代國家凍結而結構化，這就代表各種治理性和社會支配所具體累積而導致的系統性後果。

就如資本主義的隱藏傷害(hidden injuries)一般，殖民主義的隱藏傷害應該是根深蒂固的。後殖民主義必須超越普遍種族主義，把具體殖民事實作

5 請參考Chun(2000: 435-36)；我們必須在殖民主義的統治過程中反省現代國家的主體性。

為文化批判的出發點。殖民主義的實質經驗一直演變，同時在若干不同的政治狀況下分歧發展，因此對理論分析而言造成巨大挑戰。社會學理論其實反映了與殖民社會的現代性過程類似的隱藏傷害。殖民統治不僅被制度化，而且社會在現代國家的支配過程中被結構化。社會學理論同樣被理性化；上述理性化成為殖民主義最終的文化效果，如何予以抗拒才是殖民主義之「後」的要言深義。

引用書目

- Anderson, Benedict O. 199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nd edition.
- Barlow, Tani E. 1997. "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 in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edited by Tani E. Barlow, pp. 373-41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atterjee, Partha.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hen, Kuan-Hsing. 2000. "The Imperialist Eye: The Cultural Imaginary of a Subempire and a Nation-State,"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8(1): 9-76.
- .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erniavshky, Eva. 1996. "Subaltern Studies in a U.S. Frame," *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3(2): 85-110.
- Chibber, Vivek. 2013.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 Chun, Allen. 2000.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as Imperial Subject and Object," *Cultural Studies* 14(3-4): 430-61.
- . 2008. "The Postcolonial Alien in Us All: Identity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Intellectual Labor," *Positions: East Asia Critique* 16(3): 689-710.
- Cohn, Bernard S. 1987.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rks, Nicholas. 2001. *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rlik, Arif. 1994.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20: 328-56.
- Fabian, Johannes. 2000. *Out of Our Minds: Reason and Madness in the Exploration of Central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tes, Henry Louis. 1991. "Critical Fanonism," *Critical Inquiry* 17: 457-71.
- Go, Julian. 2013. "For a Postcoloni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42: 25-55.
- Guha, Ranajit. 1983.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7. "Introduction," in *An Anthropologist among the Historians and Other Essays*, written by Bernard S. Cohn, pp vii–xxvi.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1. "Subaltern Studies: Projects for Our Time and Their Convergence," in *The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Ileana Rodriguez, pp. 35-46.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 1997.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History and Power in Colonial Ind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nden, Ronald. 1990. *Imagining Indi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Law, Wing-Sang. 2000. "Northbound Colonialism: A Politics of Post-PC Hong Kong,"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8(1): 201-33.
- McClintock, Anne. 1992. "The Angel of Progress: Pitfalls of the Term 'Postcolonialism'," *Social Text* 31-32: 84-98.
- Rodriguez, Ileana. ed. 2001. *The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W.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 Scott, David. 1995.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Social Text* 43: 191-220.
- Shohat, Ella. 1992.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31-32: 99-113.
- Spivak, Gayatri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pp. 271-3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teinmetz, George. ed. 2013. *Sociology & Empire: The Imperial Entanglements of a Discipli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